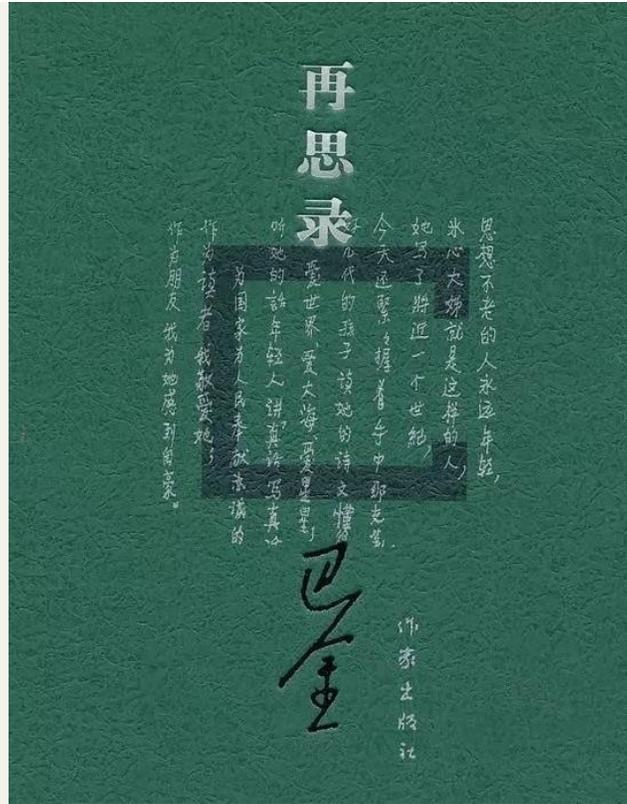


重读巴金先生的《致李楚才》



巴金的《再思录》里收有一篇他给时任上海位育中学校长李楚才的回信。这封信没有写完，因而有可能是一封没有寄出的信，自然也不会公开发表。如果巴老是勉为其难去写一篇对自己很难，讲起来也很不容易的文章，大可婉拒对方的约请，但从手稿里看，巴老有很多话想讲，也讲了很多话。写信的时间是1988年，将近三十年，那个时间对于写了近100年的这位世纪老人，还正处于晚年的黄金期，和年老体衰，疾病缠身的苦病同时并发着讲真话的炙热的情感。这篇写了未完的复信讲了什么，除了静静地躺在读者有限的《再思录》里，在自媒体泛滥的今天这个时代，在教育成为显赫话题的市井巷尾，都是一篇看不见的文字。然而看过，才知道这只是一篇老人的真话，提前说了三十年的真话。巴老谈教育的文字不多，多半也是命题作文，是否就是和其他的“教育家”讲了气场不合的话，而按下不发呢？

据说，美国政府的教育法案是由上一届政府制定而由本届政府实施执行的，这个国家不允许现在执政的政府干预教育的发展方向，他们认为教育是只有老人才有资格议论短长的领域。这篇由巴金这位世纪老人写就的未完成的短文，很值得今天的家长读了再读。

致李楚材

(此信写于一九八八年，未完稿，据手稿收入《再思录(增补本)》。李楚材，时为上海位育中学校长。)

楚材同志：

信收到。您要我为学校的纪念刊写几句话或者发表对中小学教育的一点意见，感谢您的好意，但是我得承认我这个病残的老人已经没有精力发表系统的意见、写成篇的文章了。那么就简单地讲点我个人的看法吧。我没有做过教师，也从未考虑过教育的问题，对这门学问我完全是外行，而且我自己也不曾受过完备的学校教育。似乎我并没有资格谈有关教育的事情。然而奇怪的是在我靠药物延续生命的有限的日子里，我始终摆脱不了梦魇的折磨，我给一位朋友写信说：“使我感到痛苦的是看见孩子们失去他们的童年。”的确这三四年中间我经常思考教育孩子的问题。我经常听见人说孩子是祖国的花朵，是我们的未来，几乎所有的人都把希望寄托在孩子们的身上。每当我对现实生活中的某些人和某些事感到失望的时候，我的眼前就出现了孩子们可爱的笑脸。除了他们我们能靠谁呢？自然的规律是不能违反的，我们一定要让位给他们。他们是我们的接班人。我们做不了的事可能由他们来完成。我们做不好的事他们可能做得比我们好。正因为有了他们，我们才有希望。要使他们健康地成长起来，我们的事业才能够兴旺发展。不管我们愿意不愿意，我们有责任爱护他们，教育他们。他们变好或变坏和他们受到的教育有关。我们都记得“先入为主”的古话，父母是第一个老师，不能把一切推给学校。帮助孩子健康地成长，所谓培养，所谓教育，不过是这样一句话。我们希望子女成龙，首先就要尽父母的职责。怎样做人？父母是孩子学习的榜样。家庭教育是基础的基础。

我今年八十四岁，可是我脑子里还保留着儿童时期的印象，相当鲜明。我的童年是幸福的。今天回想起来，我最大的幸福就是：父母的脾气都好，我从未看见他们吵过嘴，打骂过孩子。母亲很少教训过我们。当然父母都有缺点，但是我想来想去，想不出从他们身上我学到什么坏的东西。我相信榜样的力量不是没有原因的。

今天有些年轻的父母高兴时把孩子当作“小皇帝”、“小公主”，动了气就打骂不休。不多久，他们的坏脾气全让孩子学到了，他们希望孩子们学到的东西却相当渺茫，孩子们只会学长辈们做出来的行动，不会学他们嘴里讲的道理和心里想的理想。何况有些父母当着儿女的面什么话都说，毫无顾忌。

我越来越觉得我们这个新社会里封建流毒很多。人们还把儿女看作私产，不是把孩子当作玩具，就是当作出气筒。人们习惯说：“棍子下面出状元”，仍然用“填鸭式”的方法教育儿童。不管孩子们理解不理解，只要把各种各样的知识塞进他们的脑子，塞得越多越好，恨不得在短短的几年中间让他们学会一切，按照自己的愿望把儿女养成什么样的人。因此不论家长不论老师，都以为听话的孩子就是好孩子，整天坐在书桌前的学生就是好学生。家长说孩子做功课太慢，老师就布置更多的作业，学生不得不早起晚睡，好像学生休息愈少成绩愈好，老师也显得愈认真、负责。塞进脑子的东西越多，学生的收获越大。学生忙，老师也忙，老师脸上的血色越来越少，学生的眼睛越来越近视，仿佛孩子的脸上的笑容多了对他们的学习大有不利，一定要用过重的精神包袱压得他们笑不出声。我还记得我几岁的时候就听见人们称赞“少年老成”，在七八十年后的今天还有人安排孩子们在书桌前度过无声的童年。从小学到初中我看见我唯一的外孙女挎着沉重的书包走过我面前，她的功课水平不过是中等，每天睡不够八个小时，分数在八十上下。到十四岁才开始自理生活，还不会作适当的安排。人们要求于她的只是高的分数。不能说她不想争取高的考分，可是她动作慢，思想不敏捷，又没有时间看课外读物。我常常想我们不使她脑子开窍，单靠“填塞”、“死记”行吗？我同情这个孩子，因为我过去就是这种情况，我老是盼望有人给我一把钥匙让我的心开窍。由我自己去学，不靠别人来“塞”。倘使当时由考分决定一切，倘使只有“重点”的“尖子”才有出路，恐怕我早已变成《寒夜》里的汪文宣了。

在我的幼年，我没有机会受到正规的学校教育，请到家里来的私塾老师有的严，

有的宽，虽然用体罚也树立不起来威信，而且他们灌输给我的东西常常引起我的反感。幸而我喜欢胡思乱想，又有时间读到不少的课外读物，从它们得到很多益处。更重要的是我受到这样一种家庭教育：没有严厉的体罚，没有不公平的责骂，在比较和谐、宽松的气氛中让我的智力慢慢地发展。所以我有这样一个印象：无为而治。不过这只是十岁以前的事。这是侥幸。管得不严，不死，他们不命令，不强迫，允许我自己动脑筋想各种事情，允许我随便读一些“闲书”。我可以不断地问：为什么？为什么？当然，每次我都没有找到正确的回答，可是我养成了用自己的脑子思考的习惯。今天在大油锅里给煎熬了十年，我还不曾失去记忆，还能够讲真话，追求真理，就靠了这个习惯。我不曾学到系统的专门知识，靠这个习惯探索着，挣扎着在荆棘丛生的人生道路上一步一步地走了七八十年，摔下去又爬起来，虽然到现在还毫无成就，可是脑子依旧清醒，还能够辨别是非。让孩子习惯用自己的脑筋思考，父母可以树立榜样，老师也可以树立榜样，主要是以身作则。不论是家庭教育，或是学校教育，二者都有责任教孩子懂得怎样做人，怎样同人们友好相处。在这个基石上建筑起来的知识的大厦才是牢固的。

教育已经成了大家关心的“热门话题”。人们好像懂得了什么是“立国之本”。可是刚刚承认教育是“立国之本”以后，就听见这样一句话：“我们没有钱”。好像人没有钱，就可以在“本”上少花几文，反正孩子是未来，我是现在，只要自己过得舒适，未来自有别人负责，目光短浅的人常有这种想法。可是聪明人都知道“种瓜得瓜，种豆得豆”，种西瓜，收不到玉米。不在教育事业上下本钱，办好学校，只是把书本塞进孩子的脑子，让孩子也跟着我们满口“中华民族”、“炎黄子孙”、“悠久历史”、“灿烂文化”……这些豪言壮语究竟有多大的作用，我很怀疑。根据八十年代年轻人的想法，靠祖宗吃饭并不是有光彩的事情，何况遗产也剩得不多。我们光吃老本，不在下一代人身上花点功夫，花点力气，搞好基础教育，提高他们的文化素质和道德观念，只图目前省钱省事，这样下去，有一天会后悔莫及。是的，后悔莫及。今天大家都埋怨“社会风气坏”，我想起了“十年浩劫”，我还记得拿着铜头皮带打人的初中学生怎样把我们一家关在卫生间里。我也忘记不了在巨鹿路作协分会十四五岁

的孩子拿着鞭子追打我，要我引他到我家里去。我常常向自己发问：怎么会发生这种事情？我现在才明白这就是没有搞好教育的后果。在那些年里知识是罪恶，读书人成为贱民，学生批斗老师……人一下子就变成了兽，我看得太多了。为了这个我们几代人受了惩罚。为什么社会风气坏？人们归咎于公民文化素质的降低，这还不是没有搞好教育的结果！？岂但是没有搞好教育？明明是不想搞好。不然怎么会有这样的事情：长官修建楼堂馆所，中小学生却在危楼中上课；城市大修高级宾馆，开设舞厅茶座，学校老师却过着艰苦的生活？！有了钱就有了一切，搞活经济就搞活一切，有这样想法的人为数不少。他们牢牢记住一句古话：“衣食足而礼义兴。”以为钱多了，道德、文化就跟着源源而来。能赚钱的才对国家有所贡献。无怪乎到处都听见人吱吱喳喳，什么全民皆商论、读书无用论……等等等等，仿佛所有东西以用来作“有偿服务”，换取奖金。这样下去，即使大家都学会经商赚钱，没有办好教育，没有提高公民素质，也培养不出社会主义文明的建设者。德国和日本战后经济复兴实现得那样快，就是因为基础教育搞得好，他们重视这个“本”，他们尊重知识，也尊重传播知识的教师。倘使反其道而行之，以为自己可以随意玩弄历史，结果一定会得到历史的惩罚。据我看要改变社会风气，还是要从基础教育着手，也只有从基础教育着手。……

